



www.cpj.org

了解香港新闻审查的蛛丝马迹，不看北京看新加坡

作者 艾德琳

在报道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亲民主示威的新闻工作者得知抗议者的手机服务有问题时，这仿佛是全球各地政府对付异议人士的熟悉手段。

香港一家电台报道警方威胁关闭全部手机网络后，该消息立即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抗议者开始分享社交应用程序的链接，这些软件能够利用蓝牙技术和无线电频率来创建一个网状网络进行通讯，而不需要通讯塔。

其后一周，国际媒体头条新闻报道香港“互联网关闭”时，称这种恐吓性策略的目的在于限制抗议者之间和公众的通讯。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在群体抗议之际，由于许多人共享信息并协调抗议，频宽最终会出现问题，但是从开罗到旧金山，当局有意关闭手机和互联网服务，是把其作为示威期间的安保措施之一。在香港，有意中断这类服务特别容易触动神经，因为干扰手机和互联网服务是中国大陆新闻审查者使用的策略。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 年夏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部分通讯网络被中断数周，通讯应用软件微信也被关闭，以禁止有关保安人员与穆斯林抗议者冲突的新闻报道。当地居民和观察家担心中国的审查最终已经影响到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实上，关闭香港的互联网从没实现。这种极端的干预不太可能的原因是通讯已经成为这一高度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之有机部分，而且相对强有力的法律有助于保护数字媒体不受粗暴的审查。

正如 2014 年 10 月 1 日亲民主的新闻网站 *香港独立媒体网 (InMediaHK)* 报道说，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情况下，两条香港条例允许行政长官接管电讯电台，但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给好几家网络运营商头目下达手令。

据全球之声的翻译，该网站义务编辑林霭云（阿霭）写道，在对立法会议员莫乃光的一次访谈中莫说，“若手令一旦发出，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网络供应商必须要满足习惯于享有按照 Akamai 公司测定为全球第二快互联网的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消费者也是重要的金融业的部分，其中包括许多北京的支持者。换句话说，经济影响为每一个人保护通讯基础设施。

对于香港来说，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香港的实际威胁更为阴险。商业机构可以帮助新闻工作者接入互联网，但这些机构也可能侵蚀媒体的独立性或者使他们的网络报道边缘化，在言论自由仿佛在兴旺发展的情况下，对新闻自由起到限制的作用。随着民主人士和忠于北京人士紧张关系的升级，这种事态越来越令人担忧。

林霭云在 2014 年 11 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评论说，“亲民主的网络新闻机构面临巨大压力，”除非创办人得到政府或者商界中的某些人支持—但这又会影响他们的独立性—“这种商业模式是没有出路的。”香港独立媒体网是基金会和当地赞助者支持的。由于得到诸如办公室家具等物质捐赠，自愿者团队靠微薄的预算运作。阿霭表示，“现金流相对非常小。”

七月份，另外一个网络媒体主场新闻（*The House News*）结束运作，此前两年，该媒体为日均约 30 万的独立访客提供转载整合后的新闻和博客。信息技术企业家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回应该消息时写道，“你相信香港有可能会有自己的赫芬顿邮报，即拥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并凭自身力量就能持续的网络媒体。”

不过，主场新闻共同创办人蔡东豪补充说，这种观点是不能持续的。据全球之声的翻译，他在该媒体结束运作的告别文章中写道，“有人问我，主场新闻有没有出现抽广告的情况，答案是沒有，从未落，何來抽？”

由壹传媒集团出版的香港亲民主的旗舰小报苹果日报多年来经受住了歧视性广告市场的考验，部分原因是因为创办人黎智英的个人财力；1995年，他投资1亿美元创办了这份报纸。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壹传媒公司适应数字市场，在台湾推出壹动画，制作讽刺性新闻视频，黎智英拥抱数字业务，将其香港网站的日均单页点阅率提升最高达2000万。

报道2014年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仿佛给该媒体带来高度压力。据卫报报道，黎2013年受到威胁，而且由于2014年一次明显针对其同事的网络攻击而泄露的文件，他被指控行贿。据路透社报道，2014年12月12日，他辞去苹果日报社长的职务，此前在警方清场香港中环地区抗议者之际，他曾被短暂拘留，当时还有其他大约250名留守的民主运动人士也被拘留。

虽然苹果日报网络版越来越受欢迎，但苹果日报的金融状况越来越不稳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于2014年终止了与壹传媒的长期广告合作关系，使得该公司收入减少300多万美元。

不友好的广告市场可能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但这却是东南亚网络新闻机构面临的一个挑战。互联网为传统媒体控制提供了自由，新闻工作者成功的拥抱这种新的媒介来使信息环境多元化，但是他们仍然位于金融主流之外。该地区的网络编辑深知这一趋势，其中一些编辑正在改变全球准则，努力打入印刷市场，而美国和欧洲的网络编辑则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不赚钱的市场。

2010年，马来西亚具有13年历史的网络新闻网站当今大马 (*Malaysiakini*) 申请印刷执照，但被内政部拒绝。虽然该部不再要求新闻机构每年更新执照，但却仍然对发照过程拥有独家决定权，这种权利传统上被用来窒息批评性新闻工作者。当地媒体报道，尽管上诉法院称，内政部拒绝当今大马的申请是违反宪法的，但该部仍然拒绝了该网站2014年的执照申请。另外在缅甸，前流放人士管理的周刊*伊洛瓦底江* (*The Irrawaddy*) 的印刷版在过去20多年时发时停，但一直在网络上存在，得以保持其独立报道的声誉。

2014年*伊洛瓦底江*在仰光推出缅甸语的印刷版之后，该国信息部开始对该出版物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其名称，该部表示，此前是因为错误才批准该报目前人们所知的注册名称的。*伊洛瓦底江*报道，缅甸新推出的出版物依赖政府拥有的报纸，依靠这些报纸在军政府批准下建立起来的较大读者群推广自己的内容。但是这些广告在出版前就被稀释，提到人权和腐败调查的内容将被去除。这些出版物增加了信息量，但是当局似乎决心限制其受众。

2014年曾经获得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国际新闻自由大奖的*伊洛瓦底江*编辑昂凿 (*Aung Zaw*) 在流放地泰国营运24年，他的新闻机构被前军政权视为“国家之敌”。2014年昂凿在一篇社论中警告“缅甸大肆宣扬的媒体改革并不如看起来那般有希望。我们预期压力会越来越大。”当地政府从2011年开始释放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并于2012年取消了对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审查，但是至今并没有取消限制言论自由的惩罚性法规。2014年，自从大赦以来，至少有十位新闻工作者首次被监禁。

虽然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值得警惕，但是对香港媒体施压的模式可能更类似新加坡。尽管互联网具有革命性的潜力，但新加坡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避免了通过封锁网站或有意放慢或干扰服务进行的技术审查。据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在新加坡550万人口中，大约73%享有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而在香港700万居民中，该比例为74%。最近加入香港浸会大学的新加坡媒体学者和前新闻工作者契连·乔治 (*Cherian George*) 在电子邮件中说，“它们都有私营媒体，自我审查是日常的主要控制方式。”

新加坡也对网络媒体实行监管。2013年5月，政府对报道当地新闻、每个月至少拥有5万个唯一区域IP位址访问量的网络新闻出口实行新的执照制度。若要获得该执照就必须按要求撤下“非法”内容，否则将失去根据广播法条款要求的4万美元的保证金。虽然若干博客和网络平台符合申请此执照的条件，但政府以通过给各个网站发通知的方式选择性执行该规定。虽然受到影响的只有十家，但却包括雅虎新加坡新闻网，该网站是少数与政府管理无关的主要新闻平台之一。这种新执照似乎就是设计来将政府监管延伸至雅虎的，显示官员们意欲限制互联

网干扰传统媒体控制的能力。虽然雅虎配合这种变化，不过其负责东南亚的副总编阿兰·苏恩（Alan Soon）认为，这是“多余的。”

据当地新闻报道和人权观察的资讯，此后分别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创办的三家新兴数字媒体被指示按照广播法 2013 年的修正条款注册申请执照。根据相关程序，他们必须提供所有员工和资助者的姓名，并禁止他们接受外国资助。政府不公开披露的注册通知将现行的监管延伸至仍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 5 万访客指标的新网站：包括 2013 年 7 月被政府通知的独立新加坡（*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当年 12 月被通知的早餐网络（*The Breakfast Network*）和 2014 年 3 月被通知的母亲（*The Mothership*）。第四家被通知的是颇具名声的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网站，尽管在 2011 年已经受到压力注册为不得接受国外投资的政治团体，该网站同样在 2014 年 9 月同样被通知注册。

当今大马和伊洛瓦底江过去都大量依靠海外基金会的支持。据义务编辑林霭云说，香港独立媒体网大约 30% 的资助来自社会发展基金会。新加坡的监管机构媒体发展管理局似乎知道这种情况。在受到当地非政府组织尊严（Maruah）对其增加注册要求的批评时，该监管机构立即以反驳回应，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局承认其阻碍数字报道的意图。据网络公民报道，“责怪媒体发展管理局的注册要求导致网络商业机构无法生存固然方便，但许多网站必须首先努力争取在商业上存活下来，这也是事实。”

早餐网络拒绝满足上述要求，并终止了营运，但仍然在脸书上发表其内容。在宣布其不按照媒体发展管理局要求注册决定时，创办人默乐（Bertha Henson）写道，“要求注册否则就怎么样的做法打乱了我们尚未成形的计划，即成为一个专业且可持续经营的组织。人们询问我谁是我们的股东。的确股东就是我自己：就我一人……我应该自己承担风险，因为无论是谁，包括媒体发展管理局，都知道很难找到线上广告。”

尽管默乐不情愿的告别语气与数月后香港蔡东豪的相似，但照契连·乔治的看法，新加坡的限制更为极端。契连因为敢于直言的评论颇有声望，但其雇主南洋理工大学拒绝他永久聘约的申请，因此离开了新加坡。乔治从香港写的电子邮件说，“发生在香港的情况是一个全球比较熟悉的问题，即通过挑打他们的软肋--业主的其他商业利益--来整治媒体。在新加坡，执照意味着即使你能找到避免政府施加经济压力的办法，政府仍然可以禁止你出版。”乔治认为，执照保护的是媒体双头垄断，即政府拥有、主宰广播业的新传媒私人有限公司（MediaCorp）和几乎垄断报纸、倾向政府的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Singapore Press Holdings）。“按照法律，报业公司必须接受政府对其董事会的提名。”

不过新加坡的媒体环境对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仍然是有益的，这并不是因为两个城市的相似性，而是因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信息控制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据外交政策杂志 2003 年的分析，在中国成为那些希望执行有效媒体限制的政府最可能列举的世界强国之前，该角色是由新加坡扮演的。

据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资讯，中国在 1995 年首次允许个人互联网账号并于 1998 年推出互联网过滤技术工程，即金盾工程。据《南华早报》报道，在此期间，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回到中国后，宣传部指示所有干部学习一份详细描述新加坡成功的内部文件。

不过，新加坡自己不久就放弃了中国政府拥抱及增改后建立起来的技术过滤互联网模式。开放网络促进会 2005 年进行的测试发现，虽然新加坡的技术基础设施完全可以实现更加广泛的控制，但是该城市国家对网络的封锁非常有限，基本上只是象征性的。不过通过法律和经济限制媒体自由却没有改变。广播法下的广播（分类执照）通知是 1996 年 7 月首次通过的，2013 年被更新以对新一代的互联网机构施压。

虽然中国仍然拥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审查系统，但其执行的方式仍然值得和新加坡的方式比较。在新加坡，新闻和评论只有在具有海外基金会要素，或在当地拥有 5 万读者影响力的情况下，才会成为威胁。据人权观察资讯，2013 年 9 月，中国最高法律当局发表的一份法律解释列举了惩罚违法网上内容的具体情况，包括浏览 5000 次以上或转贴 500 次以上的信息。此解释促成了拘留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商界精英，其中包括风险投资人薛必群（Charles Xue）在内。不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独立的反政府观点在网上比比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将其全部窒息。日益成为审查和报复目标的是那些有观点的平台、有影响的个人和记者。

由于受到人身攻击、自我审查和党派偏见，香港的新闻自由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降到新的低点。从很多方面来说，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受到来自威胁新闻审查两种模式的挤压：中国大陆使用的是生硬但复杂的方法，而东南亚使用的则是较不明显的法律及经济压力。香港的规模 and 经济发展不一定非得保护新闻自由；在这两种模式中，引路的是新加坡。

但香港保持了一个较大的优势。至 2014 年底，独立媒体在那里还有空间，因为同样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民众仍然还可以上街示威以保护诸如普选这样的基本权利。

乔治评论说，“与新加坡明显不同的是，[香港]存在某种程度的健康回归，文明社会和新闻自由团体也许不可能完全抵御网络新闻机构面临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有机会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砝码。“业主和编辑们知道，如果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成本就会增加。”

希望是，一个知情且积极参与的公众能够保证，尽管独立报道的成本在增加，但干扰独立报道的赔付将会更高。

艾德琳是自由之家的网络报道自由研究分析师，前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